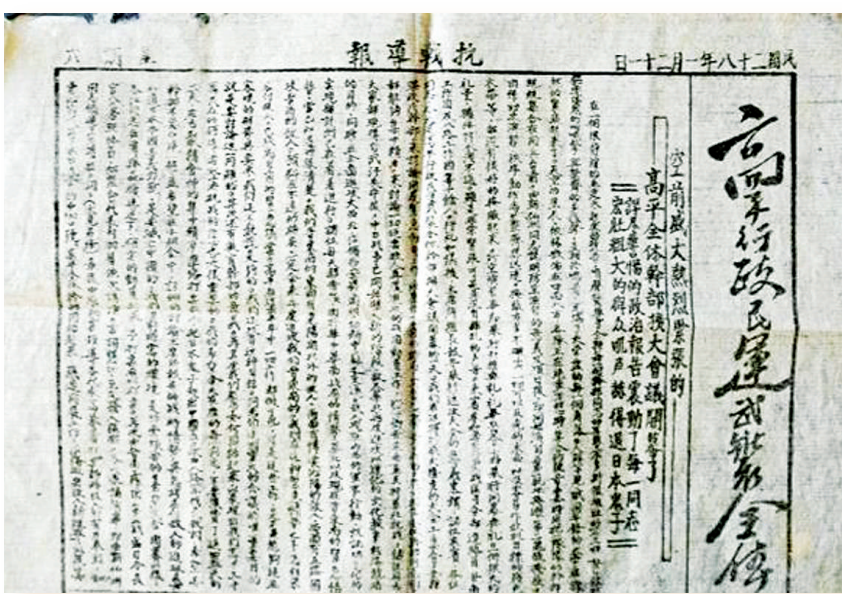


红色收藏



1939年1月21日的高平《抗战导报》

《抗战导报》

林晓白

我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抗战期间，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抗战，印发报纸即是其中之一。在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报纸中，这张1939年1月21日的高平《抗战导报》是现存历史文献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张。

1938年9月，高平县抗日政府在城内关帝庙创办《抗战导报》，高平抗日县长薄怀奇担任社长，编辑为新先母。该报主要刊载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提供的国内外新闻和主要军事消息，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报纸内容丰富，所涉内容除国内外抗战新闻外，还有经济、民生、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新闻报道。报纸除本县外，还

发行至长子、长治、屯留、沁县、陵川及晋西和豫北等地。

《抗战导报》1939年9月创刊，仅仅发行了一年时间，留存到现在的非常少见。从报纸中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现状、民情风貌，不仅高度还原了高平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面貌，也为后人研究抗日战争提供了真实史料。

高平市孟建清收藏的这张《抗战导报》，刊载了薄怀奇号召动员高平广大抗日民众积极投身抗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抗战政治宣言书，是抗战分析报告，是抗战决心书。

这份报纸保存完整，记录详细，无疑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

消暑佳品“竹汗衫”

秦婧

古代的文士大夫讲究仪容整洁。夏日炎炎，天气闷热，长袍、官服上满是汗渍，非常碍观瞻，“竹汗衫”便应运而生，成为他们常用的消暑衣物。贴身穿它，隔开外衣与肉体，增加空气流通，起到隔热、清凉肌肤的作用。



圆领对襟竹马甲(安徽博物院藏)

“竹汗衫”用极细小的竹制成，竹细如丝，亦称“竹丝衣”。各地“竹汗衫”的样式较为固定，或对襟马褂，或对襟马甲，衣服边缘处均用布料镶边。“竹汗衫”的价值在于竹编的精细度，竹材越细匀、编制越紧密，竹衣的舒适度和清凉隔热性能越好。

徽州地区盛产翠竹，质地细柔坚韧，为发展竹编汗衫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除此之外，“竹汗衫”还广泛流行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南方地区。

右图这件圆领对襟竹马甲，呈淡黄色，选料做工考究，式样古朴典雅，每根小竹管直径约1.2毫米，长度约5毫米至6毫米，粗细均匀，用丝线拼串编织成衣。衣缘处分别用白色、浅蓝色、深蓝色布料包边，系带，衣纹纹理大面积是竹编菱形纹，在袖口、下襟处有不规则分布的几圈六边形纹，在视觉上增添灵动跳跃之感。

包括这件在内，安徽博物院收藏的4件“竹汗衫”工巧料精，品相完好，实属难得，它们不仅是别致的工艺品，更是我们研究服饰文化、了解古人消暑方式的珍贵资料。

楚国印章反映汉代封国官制

肖琳

6月21日，“大汉楚王——徐州汉代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山西博物院开幕。第一单元“制同京师”展出楚国墓中出土的几枚印章，从中可以窥见西汉楚国的政治制度，真实再现汉代封国的官制与权力运作方式。

汉承秦制，刘邦建立西汉帝国后，鉴秦之衰，大封宗族与功臣。汉初诸侯王封国制度与职官皆参照帝国中央之制。徐州西汉楚王墓中出土的众多印章、封泥等，便反映出封国的官制与职能。



西汉“楚侯之印”铜印(徐州博物馆藏)

汉代官员皆印绶以表明身份。帝之玺用玉，诸侯王、丞相用金印，御史大夫等俸禄两千石以上者用银印，以下用铜印。常见的印纽形状有龟钮、鼻钮、覆斗钮等，龟钮须千石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

此次展出的几枚西汉楚国官印，印为铸造，桥形钮，皆为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楚侯之印”铜印，印台近方形，印文为篆书。“楚侯”与“楚司马”一样，为楚国军队中直接统兵之官，地位较低。《秩律》中记载：“中侯、郡侯、骑千人、卫将军侯、卫尉侯，秩各六百石。”可知，侯与千人秩都为六百石。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了“楚侯之印”近百方，表明楚国当时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

西汉“楚骑千人”铜印，印文篆书“楚骑千人”，表明此官为楚国军队中直接统兵之官，秩六百石。

西汉“楚司马印”铜印，印为铸造，桥形钮，印文中的篆书“楚司马”为楚国军队职官，当是都尉属下，主管军政。《汉书·吴王传》记载，吴初起兵，在尚未渡过淮水之际，吴王的“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行、候、司马”。可知，诸侯王国中的“司马”是军中地位较低的直接统兵之官。

三晋窑火 穿越千年

海青

晋地千百年来，煤炭产量丰厚，一直窑火炽烈。从早期的粘土陶到瓷器，陶瓷烧造一直为商品大宗，从北向南“大同窑”“怀仁窑”“浑源窑”“孟县窑”“平定窑”“榆次窑”“介休窑”“交城窑”“霍州窑”“蒲州窑”“长治窑”“阳城窑”等诸窑次第绽放，见于历代文献记载的就有30多个县烧过瓷器，山西无疑是古代中国窑业发达地区之一。然明珠蒙尘，长久以来，绝大多数山西陶器“养在深闺人未识”，混杂在北方历史名窑或大概念品种体系中，没有系统认识。经过几代文博人的艰苦探索，山西古陶瓷神秘的面纱正在慢慢揭开。

碰撞与交融——北朝釉陶

山西在北朝文明的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平城、晋阳空前繁荣。山西北朝时期出土了很多釉陶，是那个时代最精彩的釉陶产品之一。

北魏釉陶上承汉魏传统，下启隋唐新风，空前发展。釉陶俑，粗朴古拙，却极具艺术张力，杂技俑、胡人牵驼俑等，直接被后世的隋唐墓葬制度所继承。北齐的黄釉莲花尊、龙柄鸡首壶等体现了佛教文化与西域胡风的交融与碰撞，更凸显了北朝釉陶的繁华。山西北朝时期的窑场虽仍未发现，但依据墓葬出土器物浓郁的地方特点可推测，产地即在山西。

大唐之美——泽州窑与浑源窑

以泽州窑为代表的山西唐代窑口专注于茶器一道，专烧低温釉器，瓷胎致密。该窑茶器的气质，颇与茶禅之恬淡清寂、自然澹泊的精神相契合，以沉静典雅的水清釉、酣畅洒脱的白釉绿彩为代表。拓宽了唐人茶器美学的领域，提升了唐人茶器的美学品格。泽州窑产品成为销往京都晋阳、东都洛阳及供御皇家的茶器珍品。

唐代山西的另一窑口是浑源窑，受河北窑业的影响，主要烧造白瓷、黑瓷、茶叶末釉、三彩和



元黑釉剔花草叶纹瓷罐



元白瓷印花双鱼纹盘



金白瓷褐花折枝花卉纹盘

绞胎等品种。

玄衣缁袍——黑瓷

两宋以来，皇室贵胄、文人墨客推崇点茶、分茶、斗茶的游戏，建窑黑瓷因利于衬托茶色之美而受到追捧。受此影响，各大窑场纷纷效仿，山西黑釉油滴工艺随之繁荣。窑工们娴熟精准地掌握窑炉气氛和温度，利用液相分离的原理，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小峪窑的红油滴，介休窑的银油滴，榆次窑的赭银交错，平阳窑的银中套赭、赭中套银，真可谓千变万化。其幽深又富于变化的玄色之美，耐人寻味，令人折服。

黑釉剔花在山西陶瓷中同样独树一帜，是最能体现山西陶瓷地域特色与成就的产品之一。目前山西发现黑釉剔花工艺的有浑源窑、大同青磁窑、怀仁窑、乡宁窑、介休窑、招贤窑、兴县窑。辽代浑源窑刀工朴拙粗犷；金代以青磁窑为代表的窑口产品纯熟瑰丽；元代介休义棠窑装饰与造型别开生面。这些成就使得山西的黑釉剔花产品在中国陶瓷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素缁缀花——白瓷

介休窑创烧于北宋初年，历经金元明清四代，风格古拙，清新自然。

瓷质粘钉叠烧是介休窑的一项绝妙创造与发明。其方法是把耐火度高的细瓷泥浆，用粉袋挤点在碗盘圈足上，因泥浆的粘度自然拉出一个小乳钉。介休窑通常是在白瓷的碗盘圈足上粘三个支钉，其他四至六个的也有少量发现。细白瓷骨白坚硬，有的可达现代瓷的水平。装饰工艺亦是博采众长，划花、印花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白釉褐彩是介休窑极富特色的一类产品，其特点是在瓷器表面施白色化妆土，然后以褐彩绘出纹饰，再罩一层透明釉，装饰技法与常见的白地黑花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彩绘颜色是褐色的，也有学者称之为“白地赭花”或者“柿色花”。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纹饰主要是较为抽象的折枝花叶纹，此外还有团花、桃纹、鱼纹。

介休洪山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恐怕需要重新评估，一是其产品的行销范围，除了宋地，还销售到辽朝腹地，说明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类瓷器，质量较好者还被契丹贵族接受，可以比肩定窑、耀州窑等名窑产品；二是釉下彩绘技术的传承，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晚唐五代以来黄堡窑的素胎彩绘及釉下彩绘技术，并有可能对磁州窑白地黑花的出现产生影响。

兴县西磁窑沟窑址的考古发掘，为极具山西地方特色的釉下“柿色彩”瓷器制品证实了又一个产地。此窑兴于北宋早期，延续至北宋晚期。胎质坚硬，格调偏灰，草叶变形的绘画风格活



唐白瓷褐彩执壶

泼爽朗。兴县窑的发现与发掘为我们认识和探索山西西北地区窑场提供了更多的线索。

霍州窑，创烧于金代，至明仍窑火不熄。其白瓷工艺独特，承袭介休窑，采用瓷质粘钉叠烧。成品土骨细白，胎白釉细，器型秀丽。元代霍州拥有更为广阔的行销市场。除山西外，河北、浙江、包头、元大都、元集宁路故城、元亦集乃路故城，甚至蒙古国元和宁路故城遗址都发现了霍州窑迹。精美的产品和广阔的销售使它成为元代北方最为著名的白瓷窑场。

文心匠艺——河津窑

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河津固镇窑进行了科学发掘，由此揭开了山西又一窑口的面纱。

河津窑以金代遗存为主。独具一格的造型设计、极具艺术美感的画面、内涵丰富的装饰题材、大胆沉稳的剔花填黑技艺、超凡脱俗的黑地白粉书法、纯熟秀雅的三彩运用，使得河津窑在造型装饰、书法艺术、色彩呈现等方面，匠心独运，无可匹敌。瓷器上具有完全可与文人比肩的书法之作，具有丝毫不输文人画的神采与气韵，这在陶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方面，与当时普遍重视文化、道德修养，重视中原文化传承、嗜书嗜学的因素相关。

绚丽华章——琉璃

元明清山西琉璃陶器，是山西陶瓷中的又一个亮点。可以说，当时最好的琉璃陶器是山西地区烧造，最优秀的琉璃陶匠人也在山西。山西琉璃的工艺水平和无穷魅力，使其成为与广东石湾陶器、江苏宜兴紫砂器相媲美的重要产品。

从历史、文化艺术的延续性看，山西琉璃的历史更加悠久，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很多器物和建筑构件曾进入过内府，是一个足以代表山西、站立于中国琉璃陶烧造高端的重要品牌。

经由几代文博人的艰苦探索，我们终于领略到山西陶瓷发展的部分概况和风貌。在探索山西古代陶瓷手工业发展史的漫漫征程中，向前走了一大步。掀开层层面纱，还原山西陶瓷精湛的工艺成就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揭示山西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任重道远。

(图示文物均系山西博物院藏品)

北魏鎏金狩猎纹银盘

刘琳

山西博物院“民族熔炉”展厅内，有一件银盘，在展柜内熠熠生辉。这是1981年在大同小站村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北魏鎏金狩猎纹银盘，属于波斯萨珊饮食器，是王室和贵族使用的器具。盘内壁雕凿狩猎图，表现了一位男性贵族在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只身与三头野猪搏斗的场景。

这是萨珊王朝常见的图案，并以萨珊王朝金属制品惯用的锤压法制成，是国内发现的一件重要的萨珊金器。

画面中的男子为典型波斯贵族形象，深目高鼻，络腮长须，头戴半弧冠，边饰联珠，冠后有萨珊式飘带，戴缨络、耳饰、手镯。腰带上挂箭筒，足蹬半长筒靴。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他双手横执一矛，矛尖已刺入一野猪右额，右脚反踹由后方袭来的野猪，另有一头野猪正从前方的芦苇丛中窜出，整个画面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氛围。

这类狩猎题材是萨珊银器中常见的图案，但大多数萨珊狩猎纹银盘的猎者均披甲乘马，躯体部分未作充分展现，姿态平板。而这件银盘上的猎者没有骑马，只着便服，形象矫健，宛如古希腊运动员形象，明显受古希腊古典艺术的影响，这在一般的萨珊金银器上少见，是一件艺术价值很高的萨珊银器。

这件鎏金狩猎纹银盘的拥有者封和突(438-501)，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人，北魏

大臣。去世后追赠建威将军、洛州刺史。在他的墓葬中出土如此精美的舶来品，足见当时中外交流之繁荣。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间的友好往来较频繁，《魏书》记载，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给北魏皇帝带来珠宝、驯象等各种礼品。

波斯萨珊王朝也称波斯第二帝国，它是在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及伊斯兰教流行之前最后一个伊朗大帝国。国祚始自公元前224年，651年亡。萨珊王朝取代了被视为西亚及欧洲两大势力之一的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及后世的拜占庭帝国共存了400多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萨珊王朝统治时期见证了古波斯文化发展至巅峰状态，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罗马文化。实际上，萨珊王朝的文化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它的边界，影响力遍及西欧、非洲、中国及印度，对欧洲及亚洲中世纪艺术的形起着显著的作用。

在工艺方面，萨珊王朝的金属工艺制作技术引人注目，给中国的金银镶嵌工艺和拜占庭的金工技术吹进了一股新风。

金银器历来是国际贸易中的贵重商品，公元5世纪的西域金银制品在世界上的存量十分稀少，而且多以传世为主。

以这件北魏鎏金狩猎纹银盘为代表，经科学发掘出土、具有确定时代信息的文物，对于研究相同历史时期中西亚的金属工艺、器



北魏鎏金狩猎纹银盘(山西博物院藏)

物时代特征，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自汉代丝绸之路畅通后，公元5世纪的北魏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大量的西亚金银器出现在平城大同。这些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往来带来的异域文化，为传统美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美的内容，促进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变迁与发展，为隋唐的辉煌奠定了基础。